

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演进

杨东篱

【摘要】接合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本文阐述了“接合”观念从原始意义到拉克劳直至霍尔等学者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了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发展图景——“接合”“双重接合”“三重接合”。接合理论的不断推进更新了文化研究的基础观念,帮助文化研究突破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的困境。然而,接合理论却因自己过于强调受众及受众在解码活动中的能动性,过于依赖语言表达逻辑来解释文化问题等缺点,又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困扰。这些困扰甚至在文化研究内部催生了“去接合”的倾向。不过,由于接合理论与中后期文化研究及其生成语境的内在契合,它在短时期内还将继续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文化研究;接合;双重接合;三重接合;去接合

【作者简介】杨东篱,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史及文化产业管理研究。
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电子邮箱:yangdl@sdu.edu.cn(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沪),2021.3.54~64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及其中国启示”[项目编号:20820IFYT17026]的阶段性成果,亦受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资助。

接合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接合”概念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Slack 113)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中,最早注意接合理论的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他继承、发展了前人对“接合”的理解,使接合观念在文化研究中生根发芽,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直接导致了文化观念的嬗变,更新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开阔了文化研究的视野。本文将对接合理论的源头、发展、内涵及其与文化研究变迁之间的关系做出细致的梳理与反思,希望能够借此阐明接合理论自身的发展演进及其对整个文化研究思潮的深刻意义。

一、接合观念:从拉克劳到霍尔

“接合”的英文原文是“articulation”,由动词“articulate”发展而来。“articulate”的拉丁词根是“articulare”,意思是“划分为关节”。“articulate”除了从其拉丁词根“articulare”延伸出了“用关节连接、联结、铰接”的意思外,还衍生了“明确表达、清楚说明;口齿

清楚、清晰吐字、清晰发音;与……合成整体”等意义(霍恩比 94)。当“articulate”转化为“articulation”后,它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发音”“表达”和“关节链接”等。(霍恩比 95)然而,无论是“发音”“表达”还是“关节链接”,其中都有“连接”之义。“发音”是将所要表达的意义与语音连接;“表达”是将语音连接成话语;在“关节链接”中,连接的意思则更加明显。可以说,“articulation”的核心含义其实是“连接”,即将各种不同的分散部分“连”起来,至于“连”得合理与否则不在“articulation”的意义范围之内。

学界一般认为,接合理论由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明确提出并做出阐释。然而,与“接合”相关的思想观念却源远流长。拉克劳曾指出,接合观念最早可上溯至柏拉图。柏拉图的洞穴故事较早反映了接合观念:洞穴里的囚徒错误地把听到的声音与洞壁上的影子联系起来。声音与影子并非由内在逻辑关系关联,而是

被偶然激发的关系随意捆绑在一起。这些偶然激发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非必然性连接,可以被理解为接合关系(Laclau 7)。此外,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能指—所指”组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二级意指系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语言“任意重组”、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符号与权力关系、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中也包含接合关系。不过,这些思想家、理论家都没有将“接合”当作独立术语来使用。最早明确、广泛使用“接合”的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两人在《阅读〈资本论〉》(第一部分)一书中直接使用“接合”82次。然而,他们却没有“把它进一步地做出阐发”(黄卓越 4),只是用它来表达两种事物之间既随意又受特定条件限制的关系。比如,在论述只有确定经济领域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才能理解经济的实质这一问题时,他们将经济领域与法、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称为“接合”(Althusser and Balibar 100)。

接合观念最终在拉克劳那里获得了明确而详细的解释。拉克劳虽然属于新葛兰西派,但他对接合的理解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内部的“接合”,而是与巴特、福柯等一样,注意到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接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生活内部的“接合”做出了解释。拉克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将意识形态发生实际变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生产关系,忽略了现实中其他各种复杂因素,尤其是文化的影响。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其实用接合这一概念来说明比较合适:“意识形态是如何发生转变的?答案在于:通过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是通过主体的生产与话语的接合与去接合展开的。”(Laclau 109)在拉克劳看来,阶级斗争就是在阶级实践与阶级话语的接合与去接合过程中进行的。单纯考察阶级主体的实践活动并无法完全把握意识形态转变的原因。因此,“有必要承认阶级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这一事实是在接合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再生产的过程

中”(Laclau 161)。拉克劳强调阶级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事实发生在接合活动中,这就等于承认阶级活动是阶级实践与阶级话语之间的接合活动。接合活动一般遵循的是语言表达的逻辑规律。所以,其实是它将社会实践理解为某种类型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实践与话语等同起来。这就自然而然地将社会实践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解释成了实践因素所表征的意义之间的接合。各种社会实践因而能够通过接合不同阶级的话语意义,将不同的阶级利益连接起来,而统治阶级也可以借用接合来调和阶级之间的潜在矛盾。社会实践内部的各种因素就这样通过所表征的意义形成了接合关系,而“接合”也被拉克劳解释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意义非必然的持续性连接。这一理解明确概括了“接合”的内涵,并彰显了它的四个特点:第一,“接合”是一种不必然的、将各种分散部分连起来的连接;第二,“接合”是相对随意的;第三,“接合”会产生一定的现实效果,并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第四,“接合”是持续不断的。由此,拉克劳继承并发展了从柏拉图到阿尔都塞等理论家对“接合”的理解,并清晰而详细地阐释了这一概念。

文化研究中后期的主要代表霍尔,在拉克劳接合观念的基础上,最终发展出了接合理论,并将其引入文化研究中。然而,霍尔并不完全赞同拉克劳。他在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对他的访谈中指出,拉克劳“将全部实践统统概念化为话语,将全部的历史行动者都概念化为以话语建构的主体性,只谈论位置性,却从不谈位置,只看具体的个体如何在不同的主体位置性中被质询”(Grossberg 146)。也就是说,拉克劳将社会实践全部还原为语言实践,用社会实践的表征代替社会实践本身。这其实割断了社会实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联,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变成了阶级语言论。因此,霍尔希望对“接合”的阐释能够直接回到葛兰西所说的社会生活内部的“接合”上去,而不是通过语言与社会生活的

“接合”进行解释。霍尔指出,接合并非意味着社会实践就是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指的是社会实践按照语言的逻辑来运行:拉克劳的错误就在于“在拒斥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时,X如Y一样运作的这一隐喻被简约为 $X=Y$ ”(146)。在此基础上,霍尔提出了自己对接合的看法:“在英国,(接合)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的意思是发声、说出来、发音清晰。它带有用语言表达、表述等方面的含义。然而,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不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相互连接,但也可以通过它把彼此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种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141)在霍尔看来,接合是有条件限制的,一种非必然、非本质、不确定、不绝对的语言式联结,主要体现出四个特征:第一,接合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第二,接合这种社会实践活动遵循语言的表达逻辑和规律;第三,接合能够以非必然的方式连接分散的部分,在那些不必结合在一起的各元素之间形成临时、统一的构造(Barker 9);第四,接合要受到社会现实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不是永恒的,可以不断被改写。“接合”的特点导致它能够接合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也能够使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与相应的社会实践相接合,从而确立起临时的、统一的微观政治关系,形成社会暂时性的关系集合。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通过这样的“接合”被转化为各种微观政治的现实运行过程。

二、莫利、希尔弗斯通与“双重接合”

霍尔之后,继承并发展霍尔的“接合”观念,并直接使用“接合”概念来分析文化问题的主要有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罗杰·希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玛伦·哈特曼(Maren Hartmann)、卡迪拉克·考特伊斯(Cédric Couriois)等。他们的分析主要针对媒介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全

面继承了霍尔对“接合”的理解并首次使用了“双重接合”的表述。在莫利的代表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接合”出现了36次,主要指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同性质的意义在现实层面彼此通过关联结成的临时性结构,比如“英国语境中的文化与种族、民族、性别结构的接合”(Morley 15)、“宏观与微观、真实与琐碎、公共与私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接合”(17)等。莫利在论述电视与受众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电视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载体,也可以被看作意义的承载者。因此,电视是“双重接合”的产物:“它在它的双重接合中既拥有自身的意义(在市场营销与应用方面)又可以被看作意义的载体”(199)。莫利的“双重接合”显然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物理层面,也就是“市场营销与应用”层面;其二是文化层面,即“意义”层面。物理层面的接合主要体现为电视作为技术载体与作为消费对象的接合;而文化层面的接合则体现为电视作为意义载体与作为意义内容的接合。“双重接合”使得电视同时拥有了物理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双重价值。然而,莫利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两个层面的实际接合,也没有探讨这两重“接合”之间的关系。

希尔弗斯通受到了莫利的启示,将“双重接合”明确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单独提出“双重接合”之前,希尔弗斯通曾与莫利合写了论文《居家传播:技术与意义》,其中使用过“双重接合”。受莫利影响,希尔弗斯通也承认霍尔对接合概念及其特点概括的合理性,但认为霍尔的理解过于笼统。希尔弗斯通认为对“接合”的理解应该进一步细化,将“接合”过程的不同层次讲清楚。他通过分析电视中存在的“双重接合”说明了这一问题。希尔弗斯通指出,电视的第一重接合在于,电视接合了传播工具与家庭装置符号,即电视作为传播工具的科技含义,通过家庭的购买行为,与电视作为家居装置的生活含义接合在一起;电视的第二重接合在于,电视接合了公共领域与人们的私人空间,即电视的公共分享意

义通过人们对电视节目的家庭消费与人们对电视节目的私人理解接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客体,电视既是国家和国际传播网络上的元素也是家庭生活的象征。作为一个媒介,通过它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播放节目的结构和内容,它既将家庭生活成员吸引到公共世界领域来分析意义,也提供了他们形成自己私人化、内在化文化的某些原材料。”(Silverstone 83)当电视进入第一重接合时,电视只是将传播网络元素与家庭生活装置融为一体的物体;当电视进入第二重接合时,电视就成为沟通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的中介。其中,第一重接合是物理维度上的接合,第二重接合则是文化维度上的接合。希尔弗斯通认为这两重接合并非彼此割裂,而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认为它们不是分裂的(尽管在其中有阶级的转换)。”(123)希尔弗斯通将两重接合之间的关联总结为:第一重接合是第二重接合的物质基础,“电视是一种媒介和传播——它的节目、叙事、修辞与风格提供了它第二重接合的基础”(123);第二重接合则将处于第一重接合关系中的电视与其他电器及家具区分开来。希尔弗斯通将这两重接合,合称为电视的“双重接合”,并指出它印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双重接合”就是“媒介在其被生产与被接受的社会环境下运作,然后再运作”(83),“通过双重接合,媒介确实变成了信息”(83)。然而,希尔弗斯通认为“双重接合”的表述却并非源自文化研究,而是源自语言学:最早使用“双重接合”表述的是功能语言学家安德鲁·马丁内(André Martinet)。马丁内指出,语言的形态部分与语音部分对于语言意义的产生都很重要。语言形态是语言能指形式与所指意义的接合;语言语音是语素与音位的接合。这两重接合相互依存,使我们能够用预先给定的资源传达复杂的意义,进而结构语言(Hartmann 85)。

莫利与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理论并没有令学界完全满意。有些学者指出,他们提出的“双重接合”忽视了电视作为文本的独立性,亦忽视了电视文

本中的接合关系。其实,希尔弗斯通并非没有注意到电视文本的问题,他只是将电视文本内部的接合与他所总结的电视的第二重接合,即电视对公共领域与人们私人空间的接合,混在了一起。不过,希尔弗斯通后来也认为此举不妥。他说:“就像罗伊·萨马拉吉瓦有启发地指出的,信息和接合有可能是三重而不是两重:植根于对象本身的接合、技术赋予的象征环境的接合以及具体节目信息的接合。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在这章的讨论是建立在赋予前两者特权的基础之上。最后一重接合,单个的文本/信息是明显存在的,有的时候也很重要,但就像许多分析家指出的,它自己依赖于普通的象征环境,而且与整体的媒介信息流比起来,其影响是没有意义的。”(96)哈特曼较早发现了希尔弗斯通的犹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重接合”之说。

三、哈特曼、科特伊斯等与“三重接合”

哈特曼从反思受众研究中的语境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争出发,提出了“三重接合”。她将希尔弗斯通和莫利看作语境研究的代表。她认为语境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争之所以无法平息,关键在于语境研究忽略了对文本问题的考察。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理论就是忽略考察文本的典型例证。在哈特曼看来,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在两个关联层次上描述了媒介技术与意义创造之间的关系:技术层次的接合确定了媒介商品作为消费对象的意义(85);而意义层次的接合则确定了技术对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莫利是推崇“社会与物质装置之中的文化传播的过程的”(86),但希尔弗斯通却将接合从媒介的文化层面挪到了媒介的技术应用层面,用技术载体与信息之间的内在关系屏蔽了媒介消费中创造意义过程的复杂性(86-87)。因此,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其实是在论述媒介如何通过两重接合变成了一种特殊技术,而没有考虑媒介文本问题。哈特曼更细致地考察了希尔弗斯通的“第二重接合”,力图找到媒介文本在消费者再创造意义过程中的重要性,将文本

从“双重接合”中独立出来:“让我们先来反思第二重接合的具体性,不是通过媒介的具体部分,而是通过它的后果。”(87)哈特曼指出,在第二重接合中,是消费者对电视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媒介技术联结了消费者的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希尔弗斯通却认为消费者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和解释与文本内容关系不大。它只是沟通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的工具。媒介技术才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关键”(88)。同时,希尔弗斯通也不注意媒介文本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所以,哈特曼引用莫利的话说:“对文本或信息的分析仍然具有基础的必要性。”(88)因为文本或信息并非仅有一个真实含义的客体,它的意指机制会生发出许多丰富的含义。正如《居家传播:技术与意义》一文指出的:电视的意义由读者日常生活活动催生;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异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多种方式;意义的结构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辩证过程(Morley and Silverstone 46-47)。这些都会导致文本产生丰富的意义,使其成为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被忽视的因素。哈特曼因此明确提出,要平息受众研究中的语境与文本之争,“我想指出并不只要回到双重接合,而要扩展到三重接合”(Hartmann 96),而第三重接合就是受众与文本之间的接合。这一接合并不仅是一种仪式和参与,而且也包括读者个体对文本内容的再创造,如再创造出了读者个体化的传播事例、个体化的节目、个体化的网站和个体化的文本信息,等等(96)。将受众与文本的接合从“双重接合”中独立出来,关注媒介与意义再生产之间的联系,关注意义解释潜在的新可能性以及警惕文本结构运用权力对解释进行干预,这“绝对不仅是对一种独立的媒介信息的回归”(97),也是对媒介作为文本价值的肯定。由此,哈特曼在希尔弗斯通“双重接合”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介对受众与媒介文本内容的接合,组成了“三重接合”。哈特曼将她的“三重接合”分别总结为: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对传播工具与家居装置的接合;媒介作为象征环境

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接合;媒介作为文本对受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

科特伊斯(Cédric Courtois)等学者并不赞同哈特曼的“三重接合”观点,继而提出了另一种更具实践价值的“三重接合”。科特伊斯等学者首先注意到了21世纪一个普遍的流行文化现象,即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充斥了大量丰富的媒介技术:“根据最近的OECD指数,西方的家庭生活配置了相当丰富的媒介技术。其后果表现为,在这些媒介技术丰富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在很小年纪时就需要面对大量的媒介技术资源。”(Courtois 402)他们以此为契机开始思考媒介消费是否能够帮助青少年确立自我认知,在媒介消费中获得自主权。科特伊斯等学者发现大多数关于这类问题的探讨都以消费者与媒介文本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展开,但他们认为媒介文本与媒介技术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们就注意到了希尔弗斯通既强调媒介技术也关注意义传播的“双重接合”理论。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的意义就在于,他将媒介既解释成物质载体,又解释成有意义的文本的传递者。然而,他们认为,在这两重接合中,希尔弗斯通却忽视了语境问题。语境“就是电视观看行为与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的地方,也是电视观看行为通过多种关系组织与再组织的地方”(424)。它对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是有影响的。在希尔弗斯通的第一重接合中,媒介接合的是传播工具与家庭生活装置。然而,媒介接合的传播工具是电视、电脑还是“手机、移动游戏机与移动媒体播放器”(425),这一接合是发生在卧室,发生在客厅,还是发生在餐厅或阳台,他并没有说明。在希尔弗斯通的第二重接合中,媒介接合的是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不过,希尔弗斯通所谓的公共世界,主要是媒介所连接的象征性的公共世界,而不是具体的物理公共世界。媒介的这一接合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物理公共世界,是公园、剧院、街道还是公司,周围有人还是没人,周围的人是兄弟姐妹、父母、亲戚、朋友

抑或是陌生人,也没有被说明。可见,希尔弗斯通忽略了第一重接合与第二重接合的具体物理发生语境。在他的“双重接合”中,消费者的媒介消费环境与其消费行为之间仿佛毫无联系。因此,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必须将媒介对受众与消费环境的接合视为一重独立的接合,以更加清楚地解释受众媒介消费行为发生的原因。科特伊斯等学者随后又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希尔弗斯通第一重接合的发生地点主要局限于家庭空间,而受众对媒介的消费事实上在某些时候并不仅限于家庭空间:“多种类型的电视与电脑会出现在多种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而移动设备则会从一个语境移动到另一个语境。”(436-437)科特伊斯等学者于是在该发现的基础上对希尔弗斯通的第一重接合进行了改造,将其改造成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对传播工具与装置的接合,而不仅仅是与家庭装置的接合。这构成了科特伊斯等学者的又一重接合。然后,科特伊斯等学者指出,哈特曼的第三重接合,即媒介作为文本对受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揭示了媒介技术与媒介文本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媒介技术传递有意义的文本的价值,可以单独作为一重接合。由此,科特伊斯等学者,在拆解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与哈特曼的“三重接合”的基础上,对接合理论做出了修正,进而提出了一种与哈特曼完全不同的“三重接合”理论。他们解释说,媒介在他们所提出的“三重接合”中的角色主要体现为:“媒介作为客体的象征性互动(第一重接合,比如电视、电脑等);作为文本(第二重接合,比如诗歌、游戏、视频等);作为语境(第三重接合,主要是各种情境比如独自在卧室里,与家人在客厅里等)。”(402)根据这一解释,科特伊斯等学者的三重接合可以被总结为: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对传播工具与装置的接合;媒介作为文本对受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媒介作为语境元素对受众与消费环境的接合。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在这三重接合中,第三重接合对媒介消费行为的现实影响最大,因此可以在第三重接合的理论视域

中来探讨他们感兴趣的实践问题。科特伊斯等学者通过调研获得了关于青少年使用媒介的地点、时长等方面的大量实证数据,从中分析青少年受众与消费环境之间的接合关系。他们进而在这一接合关系中深入考察媒介消费是否能够帮助这些青少年在诸多环境因素影响的干涉中确立自我认知,在媒介消费中获得自主权(40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渴望通过接合理论解释实践问题的初衷。与哈特曼的“三重接合”相比,科特伊斯等学者的“三重接合”理论的实践价值更加突出。

从霍尔、莫利直到希尔弗斯通、哈特曼和科特伊斯等,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发展路径,其内涵和应用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在内涵上体现出由笼统到逐步细化的趋向,在应用上则体现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逐渐过渡的趋向。霍尔对“接合”的研究止步于理论探讨,主要是在梳理前人如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接合”的内涵和特点做出理论阐释,而缺乏对具体媒介“接合”实例的分析。莫利全面继承了霍尔对“接合”的理解,具体讨论了电视这一媒介的接合问题,着重分析了电视技术、电视文本、受众生活方式、公共意义空间等因素彼此之间的接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这些接合关系中体现的微观政治内涵。莫利比霍尔更具体,但仅在探讨中涉及“双重接合”,并没有把它当作独立、固定的术语来解释。希尔弗斯通敏锐地发现了接合在媒介消费实践中的层次问题,明确提出并细致阐释了“双重接合”。然而,希尔弗斯通对电视文本以及电视文本中接合关系的忽视使他的“双重接合”体现出了唯技术、重应用倾向的弊端,从而颇受诟病。在此背景下,哈特曼又提出了“三重接合”概念。哈特曼指出,可以将文本内的接合关系直接当作第三重接合加到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上,以解决后者存在的问题。哈特曼由此提出了“三重接合”概念。哈特曼提出的“三重接合”意在解决受众研究中的语境与文本之争。

然而,当她的“三重接合”被应用到现实层面时又出现了问题,因为单纯读者与文本的“接合”只能够展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而不能解释读者如此理解的原因,也不能解释文本如何影响读者这样更深入,也更具有实践性的问题。因此,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应该提出另一种能够更有效解决实践问题的“三重接合”理论。科特伊斯等学者以现实中一个具体的媒介消费问题,即十几岁青少年的媒介消费是否可以确立自我认知,获得自主权为契机,重新定义了“三重接合”。他们特别强调第三重接合,即技术媒介作为语境元素对受众与消费环境的接合,对媒介消费行为的现实影响。科特伊斯等学者对语境接合的关注拓展了希尔弗斯通与哈特曼将接合语境仅置于家庭内部的狭隘视野,从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去考察媒介的消费行为。同时,他们也超越了后两者将接合理论仅仅看成理论分析工具的局限,将接合理论的使用拓展到了实践层面。不过,科特伊斯等学者对语境接合的过度重视也有走向詹尼斯·拉德薇(Janice Radway)的“语境激进主义”之嫌。“语境激进主义”仅仅将语境当作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最终落脚点,而屏蔽了媒介技术、物理载体、文本等其他许多在接合过程中对接合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元素,可以说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偏激性和狭隘性。

四、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困境的突破

霍尔、莫利、希尔弗斯通、哈特曼和科特伊斯等学者提出并做出阐释的接合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接合理论基本平息了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困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之争,帮助文化研究走出了困境。

伯明翰学派乃至整个文化研究在前期主要依循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将文化的定义分成三种: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它将文化看作“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The Long 57)。二是

“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它将文化看作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它将文化看作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第三种文化定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文化观念,一般被表述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Higgins 49)。

“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现为:首先,它延续了传统精英文化观念对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强调,肯定了人类主体意识与主体经验的能动性,将文化解释为“既是产生于各种独特社会群体和阶级中的意义和价值”(Hall 38),“又是活生生的传统和实践”(38)。其次,它还超越了传统精英文化观念仅从精英层面来理解文化与文化活动主体的局限,将文化与文化活动的主体扩展到民众层面:它主张从日常生活角度理解文化,认为文化应该表现在日常生活内部产生的普通观念、情感与意识。它也强调文化通过整合日常观念、情感与意识来结构社会生活的功能。它还关注普通工人和平民在文化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自然毋庸置疑,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体现为:第一,它通常指的是生活格调、个人习惯、道德举止等,能够概括生活方式的冲突和变迁却体现不出其倾向性,而文化则需要表达倾向性。所以,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一度希望用阶级意识代替“整体的生活方式”来概括文化:“阶级意识就是以文化术语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它体现为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Thompson 10)第二,虽然它力图凸显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但由于它缺少对个人倾向性的强调,实际并无法真正凸显这一点。第三,表达倾向性还意味着表达意义。“整体的生活方式”不涉及人的倾向性,也就没有体现文化的表意功能。第四,这一观念模糊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整体的生活方式”对倾向性与表意性的忽视直

接导致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将文本社会学分析与民族志当作研究方法。这就消解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差别,将文化研究几乎等同于社会学研究。

以法国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英国学界后,文化主义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并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危机:“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Hall 39)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理解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他们详细阐述意识形态,以至于“‘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突出”(39)。阿尔都塞指出,“它们(指意识形态)通常是形象,偶尔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不是通过人的‘意识’被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人们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Althusser 233)。同时,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还包括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出来的物质实践以及由这些实践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仪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教育、宗教、家庭、政治、传媒、文化工业等都属于它(Storey 102)。因此,“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各个具体的个体‘塑造’成主体的功能(这种功能界定了意识形态的范畴)”(102)。阿尔都塞为意识形态下的定义以及他的进一步阐释其实隐含了他对文化的理解。在阿尔都塞看来,文化并非由人类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创造,而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形态“通过一个人们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进而构成了文化的潜在结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中,人们成功地改变着人们之间和人们与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Hall 42)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因此可以被表述为,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它通过表征意识形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组织。这一文化观念同“整体的生活方式”一样关注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组织。不过,它更重要的特征则在于同“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区别。这些区别体现为:第一,明确指出了文化与

文化的活动主体是被意识形态建构并决定的。第二,强调了文化的倾向性。第三,关注了文化的表征功能。

通过对结构主义范式文化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结构主义范式也重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介入,但它否定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随之忽视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它强调的是文化由意识形态带来的倾向性与表征功能。它对文化倾向性与表征功能的重视弥补了“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缺陷,但它对文化和文化活动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否定以及对民众在文化活动中能动性的忽视,却给予了文化研究沉重的一击。如果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被否定,文化研究还能被看作是对文化的研究吗?如果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被忽视,文化研究的特色又体现在哪里呢?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必然产生动摇,文化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也必然遭受质疑。而“整体的生活方式”忽视文化的倾向性与表意性,对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强调不足,这使得“文化主义”在面对“结构主义”挑战时毫无还手之力,必然陷入危机。

接合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它代替“文化主义”接受了“结构主义”的挑战。接合理论既继承了文化主义对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强调,又凸显了它提倡的民众能动性,还增加了结构主义对文化倾向性与表征功能的理解。这才使得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从“两种范式”之争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可以重建文化研究在现实中的存在合理性。

如前所述,无论是“一重接合”“双重接合”还是“三重接合”,它们首先都必然是社会实践,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精神活动。这保证了文化研究早期一贯主张的文化与文化活动的日常性与平民性。其次,这些接合都遵循着语言表达的逻辑和规律,一方面通过媒介符号从总体上对不同的社会实

践活动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则通过媒介符号表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文化整合社会实践,进而表征意义的功能因而得到体现。再次,这些接合是一种临时性的结合体。受众根据自己即时的需要、心理与行为解读媒介符号,从中体现某种接合关系。一旦受众的需要、心理与行为发生变化,受众解码活动中的接合关系也会随之改变。这充分体现了民众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后,受众的需要、心理与行为一般会受到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通常会展现在受众解码活动内含的接合关系中。它既保证了文化与文化活动的倾向性,也为受众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设定了上限。

“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强调接合的实践性,遵循语言学的逻辑和规律,看重接合的临时性,认识到接合会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特点恰好符合霍尔概括的突破“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困境所必需的文化研究的根本原则。霍尔指出,“无论‘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但是在对它们各自的活力和局限的粗略比较当中,可以显现出文化研究的一些根本原则”(Hall 42)。霍尔根据“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各自对文化的理解概括了文化研究的这些原则,其中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对意识斗争发展和组织的阐释、“经验”的去中心化属于“结构主义的巨大活力”(42),而对“整体性”的强调则属于“文化主义的活力”(45)。接合理论对接合实践性的强调属于对意识斗争发展和组织的阐释;遵循语言学的逻辑和规律属于对“经验”的去中心化;看重临时性的接合属于对“整体性”的强调;认识到接合会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属于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

因此,可以从接合理论出发对文化做出新的解释。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也正是这样做的,其中的主要代表是霍尔与费斯克(John Fiske)。在霍尔之前,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注过文化的表征功能。他指出:文化是“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的“符号系统”(Culture 13)。在该文化观念中有接合理论的影子,但它毕竟未受接合理论的影响,不能算真正反映接合理论。最早在接合理论影响下理解文化的还是霍尔:“文化就是语言用来赋予事物意义的不同种类的体系与随意的构成。”(Rojek 165)在霍尔看来,文化就是事物与语言接合的产物。这一接合是临时性的,由一个社会或集团成员的语言所表征,遵循语言学的逻辑与规律,既发挥社会功能,又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观念强调文化的表意性,也注意突出文化的价值性与倾向性,亦突显了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自主性。费斯克等学者后来将霍尔的文化观念进一步修正为“文化是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John Fiske 68)。“接合”在这一观念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该观念保留了对文化表意性及倾向性的强调,却更明确了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平民在文化生产与流通中的主体地位。不过,它对平民主体地位的确认却比较隐晦。它指出,文化包含的是“感觉、意义与意识”。这首先暗示了文化的相关主体可以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社会层次不高的平民。然后,它强调了工人和平民在面对“感觉、意义与意识”时具有主动性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进而确认了他们在文化生产、流通中的主体地位。

从接合理论出发,通过对文化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伯明翰学派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新文化观念。新的文化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此后,文化研究在解释文化介入社会功能的时候,不再仅仅停留于将文化阐释成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剖析民众的文化解码活动,将文化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更具体、更深入地展示出来。文化研究由此在文本社会学分析法、民族志法

之外又增加了符号分析法、受众研究法等新方法。同时,文化研究的重心也从生活文化转向了媒介文化,从文化生产研究转向了文化受众研究。在这些转向中,民众的文化活动主体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扬。更新的文化观念、拓展的研究方法、转型的研究重心以及对民众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明确张扬共同构成了文化研究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就将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霍尔主要在参照葛兰西、突破拉克劳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接合”的理解,并开启了接合理论的文化研究之旅,因此接合理论对文化研究的贡献也被很多学者概括为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接合理论在为文化研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困扰。这些困扰主要体现在:第一,接合理论使中后期的文化研究过分关注解码者,而没有注意编码者的活动。这容易导致文化研究忽视文化的教育功能。任何解码者对媒介符号的解读都不可能不受到编码活动的影响。然而,“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三重接合”关注的中心都是解码者。中后期的文化研究因而完全围绕解码者来思考媒介符号的解读,并没有考虑如媒介文本的创作意图、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关系等编码者角度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解码者甚至可以不受编码活动的限制,自行决定媒介符号的意义,完全随意地解读媒介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接合理论过度关注解码者,忽略编码者,实际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甚至否定了文化的教育功能。

第二,中后期的文化研究过分关注解码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忽略了解码者的受控性与受限性,因而加剧了文化研究的文化民粹主义色彩。如前所述,在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中,“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都是临时性的接合体。这些接合体依附于受众即时的需要、心理与行为而存在。一旦后者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接合关系就解体了。新的接

合关系需要根据受众新的需要、心理与行为重新组织。受众因而在媒介符号的解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媒介符号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受众自行决定。这固然保证了民众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却没有对民众的阐释加以限制。虽然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也强调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条件对受众需要、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将这种影响解释为对受众的限制,而将其解释为对受众的馈赠。这样的解释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刻意抬高了民众文化活动与符号经验的价值。然而,现实中民众的文化活动与符号经验并不符合理想。因此,中后期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论预设并不合理。这致使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加剧了文化研究的文化民粹主义色彩。

第三,中后期的文化研究忽视了对社会生活的真正介入,陷入了纯粹的文本政治。在中后期的文化研究者们看来,“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都遵循着语言表达的逻辑和规律。它们通过媒介符号,在对不同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中表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就将丰富复杂的社会活动从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可供解读的文本。民众只要成为能动的、不受控的、狡猾的受众,在符号层面进行挪用和拼贴,就可以对现实的社会权威与社会秩序作出抵抗。事实上,这种抵抗只能是象征性,甚至想象性的,对于现实的社会权威与社会秩序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这种理解导致文化研究演变成了一种精细的操作程序、一种脱离现实的学院空想以及一种纯粹的文本政治,也使得文化研究学者逃避了真正的现实社会责任。

近几年,伯明翰学派的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接合理论的缺陷以及它带给文化研究的新困扰,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去接合”。“去接合”意味着拆解有条件限制的非必然、非本质、不确定、不绝对的语言式联结,使彼此联结的要素重回分散和零乱的状态。“去接合”并非伯明翰学派首创。拉克劳在

解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时就将对误导性关系的解除称为“去接合”(Laclau 7)。霍尔也曾用“去接合”解释不同元素之间接合关系的临时性。然而,直到詹姆斯·伯格(James Berger),“去接合”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获得了明确的解释:“‘去接合’是发音形态学的术语,意指音素组合的混乱。‘去接合’是外科手术、屠宰与厨艺中使用的术语,意为肢体在关节处的分离或切开。当一个人被‘去接合’时,他就被迫与社会的有机结构分开,意味着羞耻、沉默,甚至可能是物理性地被忘记。”(Berger 2)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也特别论述了表征性别、种族、年龄身份的消费符号与阶级、阶层之间的“去接合”问题。默克罗比指出,伯明翰学派以前一直比较强调上述两者之间的接合关系,力图通过这一接合关系证明符号介入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但近年来,鲜有文化研究的论著再把性别、族群和年龄编织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研究问题中去了。这一方面缘于政府数年来为缓解资本和劳工的对抗而不断使用意识形态手段,有意识地剔除阶级社会的各种连接;另一方面也与伯明翰学派以往理论中体现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有关。在伯明翰学派中后期,CCCS的许多论著夸大了民众的文化抵抗力量,过分强调了表征身份的消费符号的抵抗功能。“但正如批评该中心的人所示,这些行为都是短命的反叛,有的迅速被引入了媒介生成的商业机制。”(默克罗比 96)身份符号介入现实政治的能力以及它们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在此前提下,默克罗比明确提出:“我接过‘去接合’(disarticulation)的理念,借以显示,性别与阶级问题割裂了。”(93)

默克罗比提出的性别、种族、年龄等身份符号与阶级、阶层之间的“去接合”问题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实际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对其中后期微观政治研究合理性的整体怀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他们更加重视研究

的现实客观性,而逐渐减少研究者主观意图介入的新趋向。这向接合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接合理论如果能够在保持接合观念作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对文化实践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就能够很好地迎接这一挑战。然而,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非短时期可以解决。就目前而言,由于接合理论自身与中后期文化研究及其生成语境的内在契合,这一理论目前还将继续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从事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Althusser, Louis. For Ma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 [2]Althusser, Louis,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art 1).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1970.
- [3]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2000.
- [4]Berger, James. The Disarticulate: Language, Disability, and the Narratives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Courtois, Cédric, et al.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Audiovisual Media Consumpt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 14.5(2012): 421-439.
- [6]---.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eenage Media Consump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4.3(2011): 401-420.
- [7]Fiske, John, et al. eds.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8]Grossberg, Lawrence.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131-150.
- [9]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John Storey.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6.31-48.
- [10]Hartmann, Mare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Eds. Tomas Berker, et al.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80-102.

[11]Higgins, John.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2]阿尔伯特·悉尼·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Honthy, Albert Sydney.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7th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13]黄卓越:“文化研究:追忆与讨论——在伦敦访斯图亚特·霍尔”,《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2007):1-7.

[Huang, Zhuoyue."Cultural Research: Retrospection and Discussion—Visiting Stuart Hall in London."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5(2007): 1-7.]

[14]Laclau, Ernesto.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NLB, 1977.

[15]安吉拉·默克罗比:《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McRobbie, Angela. Be Creative: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 Trans. He Daok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16]Morley, David.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2.

[17]Rojek, Chris.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18]Silverstone, Roge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9]Slack, Jennifer Daryl."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s.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113-129.

[20]Storey, Joh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22]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Fontana Paperbacks, Glasgow: Collins, 1981.

[23]---.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Pelican Books, 1965.

Articulation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Yang Dongli

Abstract: Articulation theory has special value for cultural stud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articulation" from its origin through Ernesto Laclau to Stuart Hall, and goes on to portray articulation theory's developing landscape in cultural studies—from "articulation", "double articulation" to "triple articulation". The developments of articulation theory have updated foundational concepts in cultural studies, helping it break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alism" and "structuralism". However, articulation theory has also complicated the scene of cultural studies, as it overemphasizes the agency of audiences in decoding activities and overly relies on language's expressive logic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issues. The complications have even developed the tendency of "dis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Nevertheless, due to articulation theory's intrinsic conjunction with mid-and-late-stage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context, it would still function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articulation; double articulation; triple articulation; disarticulation